

诗化人生:吕进 1980 年代以来的诗学活动

陈 卫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在 1980 年代出现的诗评家中,吕进是较为独特的一位。他于外文系毕业,因此他的诗学研究长于中外参照,具有比较的世界性视域。自 1980 年代以来,他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著作,由诗歌基础理论向诗歌内部原理深入,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诗歌观念,并从生活中提炼通俗词语来解释艰深的诗歌理论,借鉴古代诗话文体,创办新诗所,创办诗歌刊物,参加社会活动,以入世精神普及诗歌并开创诗学研究的新课题。诗与时代、国家、民族、大众、个人的结合,是吕进诗学研究的特点。

关键词:吕进;诗学研究;八十年代;学院派;中国性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1-0031-06

吕进与 1980 年代出现的多数诗评家一样,先为少年诗人,在本地区、本省乃至全国颇有名气。80 年代因社会变化,诗坛倾斜,出于对理论本身的兴趣与普及诗歌的责任意识,自然而然地转向了诗歌理论工作。吕进与这一代诗评家多为中文系出身不一样,他是外文系毕业生,所以他在诗学研究中更方便地使用中外参照,具有比较的世界性视域。

从 1981 年到 2010 年,如果把主编、合著的著作加在一起,吕进出版了诗学专著 27 部,64 卷。主要有:《新诗的创作与鉴赏》(1982,重庆出版社)、《给新诗爱好者》(1984,重庆出版社)、《一得诗话》(1985,四川文艺出版社)、《新诗文体学》(1990,花城出版社)、《中国现代诗学》(1991,重庆出版社)、《吕进诗论选》(1995,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画梦与释梦——何其芳创作的心路历程》(1995,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化转型与中国新诗》(2000,重庆出版社)、《对话与重建——中国现代诗学札记》(2002,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现代诗歌文体论》(200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 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2004,重庆出版社)、《中国现代诗体论》(2007,重庆出版社)、《吕进文存》(四卷本,2009,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在这些专著中,从诗歌的基础理论概念的解释到诗歌文体的广泛研究,似乎让我们看到一个新诗研究的狂飙突进时代的到来。

80 年代诗学研究是蓬勃的,来源于诗歌创作与接受的热情高涨。不可回避的是,对中国多数教育程度不高的读者来说,接受诗歌远比接受小说、散文难得多,他们不习惯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的距离,也不适应跳跃性的诗歌思维。正因为长期的新诗理论空白,使一批曾经年少的诗人自觉投入诗歌理论建设当中。谢冕对新诗的发展规律进行反思;孙玉石执着现代诗歌的系统研究,发掘现代诗歌的关键因素;陈良运由新诗评论转入古代诗论,挖掘古诗论精华;吴思敬从心理学角度阐释诗歌创作与接受的过程;吕进从诗歌基础理论跟进到文体建设,成立中国新诗研究所,创办刊物,主持诗歌前沿讨论专栏,继 20 世纪发起新诗理论界的“上园派”,近年又提出“新诗二次革命”等口号,全身心地构建当代诗学体系。

一、启蒙与深入:诗学观撷英、评点

《新诗的创作与鉴赏》是当代诗学著作中较早出版的一部诗歌理论著作^[1]。该书对诗歌的来源、定

* 收稿日期:2010-11-01

作者简介:陈卫(1970-),女,江西萍乡人,文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义、内容、形式、修辞、写作、鉴赏等多方面进行了论述,提出诗的本质特征是抒情美,诗是文学中的文学^{[2]37}。在著作中,经吕进辨析过的概念有诗如画、诗与音乐等。他得出的结论是:诗是画的降低,更是画的提高;诗是音乐的降低,更是音乐的提高;诗不但是普遍的艺术,也是最高的艺术^{[2]3-34}。如诗歌叙事与抒情的问题,吕进从自我的阅读经验中得出体会:“凡是叙事的地方,诗里就出现快镜头;凡是抒情的地方,诗里就出现慢镜头。”^{[2]52}凡是涉及事,诗就像一个专抄捷径的伶俐者;凡是涉及“情”,诗就会变成一个专走弯路的慢行者。同时吕进还认为:“不能在诗之外谈诗,也不能在诗之上谈诗。”在解释诗歌观念时,吕进一般都从大量的古今中外诗歌作品解读中提炼诗学观点。比较有独创性的是那个让古往今来的理论家头痛的诗的定义。吕进的观点是,诗是歌唱生活的最高语言艺术,它通常是诗人感情的直写。给诗下定义是可行的,但要提出四海皆通的诗歌定义有高难度,所以,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给诗下定义,还是吕进给诗下定义,或是吴思敬采用排除的方法给诗下定义,都只能针对某一时期的诗歌特色而言。他的这一概念应是对80年代之前诗歌的提炼。

《给新诗爱好者》侧重于指导诗歌写作,实际上是吕进给新诗制作的一件燕尾服样品,里面涉及很多具体的诗歌写作标准,如独特的搭配、弹性等写作技巧的举例,诗家语如何炼造,以区分生活中的语言,诗歌艺术表现的实与虚等,这些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讲解,对新诗爱好者与写作者应有不少帮助。《诗评断想》是吕进对诗评工作的一些思考——从如何写诗的理论探讨,转向如何做诗评人的思考。这是当代诗学的一个分支,很少有人专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断想对端正诗评人的态度与拓展诗评人的学术视野有一定的帮助。也许是针对学院派诗评家的某些弊病,吕进指出:“诗评家固然应当是博学家,但他首先需要的是:对美的感受力、辨别力、鉴赏力。”

《中国现代诗学》出现在新诗潮争议过去而中国诗坛处在发展迷途当中,诗歌创作者各路狂突演绎,批评家失语的时候。吕进结合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实际,试图建立具有特色的中国诗学。这也是吕进积多年底蕴进行的一次诗学突破。“《中国现代诗学》是我十余年的新诗研究的学术生涯的第一个句号。它是一个阶段的终了。一个比较完整而又尽量求实的理论体系提出来了。”^{[3]381}他自信“一部优秀的科学论著必然会改变、调整以往的有关论著的传统价值和传统位置”^{[3]381}。这部著作在几组关系上论述得十分清楚:一是中国现代诗学与西方诗学的对比;二是日常性生活语言与诗家语的对比;三是散文语言与诗歌语言的对比。

吕进对中、西方诗学的反思从诗学概念比较开始,他说:“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以抒情诗为本,推崇体验性的诗学观念,同时又在诗对客观世界的历史反省能力和形象性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领悟性、整体性、简洁性的形态特征,同时又在系统性、理论性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在诗学发展上,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通中求变,同时又不拒绝在艺术的探险精神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4]3}

吕进关注诗歌的形式,特别强调诗家语,他说:“陌生化,就是诗歌语言对散文语法与修辞规范的抛弃,或者说,就是诗歌语言遵循自己独特的语法与修辞规范。诗是语言的超常结构,它是对一般语言的语法和修辞法则的创造性破坏”;“要求读者不断注意到语言本身。运用诗歌语言有如跳舞,跳舞不是要走到哪里去,它本身就是目的”^{[4]74}。“诗凭借语言媒介成了最自由的艺术,但是语言却由于成为诗的媒介而成了最不自由的语言……它同时受制于表情系统、表音系统和表形系统,必须满足这三个系统的要求。这种极端的自由与极端的不自由的统一,就是诗歌语言。从王安石开始,叫诗家语。”^{[4]77}

阅读这部著作,对写作者和评论者来说,有所收获的不仅是通过对中国现当代和外国诗的解读来理解某些诗学概念,吕进还会通过诸如一家刊授学院老师用散文方式来评判一位青年诗人的诗歌而造成的啼笑皆非的情形,让读者具体了解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的表达差异。

“抒情诗”是著作中的关键词。吕进指出抒情诗的媒介特征有音乐性、弹性、随意性,抒情诗的寻言是通过五种修辞方式达到的,即虚实相生、时空转换、象征、转品和跳跃。他认为一切好诗都是有诗意无语言、有功夫无痕迹的。

从总体上讲,《中国现代诗学》明显加深加大了研究的深度与力度。这部著作不是诗歌观念的普及,而是深入到诗歌内部进行问题的探讨。吕进自己认为与《新诗的创作与鉴赏》相比有两大突破,突破了

抒情说和音乐性。很明显,吕进进入90年代以后的突破是因为他关注到诗歌写作自80年代中后期发生了转型,传统的诗歌要素面临丧失或转化的可能。因此,他把论述视角直接针对诗歌的一类形态——抒情诗,避免了诗歌概念的泛指。

正如孙绍振在《西方文论和中国经典的痛苦搏斗》中所说“中国的特殊性,并不包含在西方理论的现成体系中,而是要中国人自己去分析,自己去衍生,自己去颠覆,自己去发现”^[5],的确,不仅是西方文论,就是中国早期的理论著作,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思潮及意识形态变化,都会显现出时代性的局限。吕进较早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中国现代诗学书后》中,他说:“新诗研究空前活跃:对历史和当代的每一种诗歌现象几乎都存在着多种理论视角。《新诗的创作与鉴赏》虽然是这类著述中较早出现的一种,但是艺术的辩证法就是这样——‘较早’出现也可能‘较早’过时。”^{[3]380}吕进试图在寻找诗中稳定的东西,他转向了诗歌文体的研究。这是他研究领域的又一次大力开拓,也是他研究形成特色的开始。

拓展新诗研究的版图,是吕进一进再进的工作。如果说《中国现代诗学》是吕进有意识地奠定中国现代诗学的基石,那么《新诗文体学》是吕进在寻找诗歌最显著的特征,以求抓住诗歌的本质。他从诗歌写作入手,指出诗的形象来自现实现象与超现实想象,通感是诗歌的表现方式之一,有主观性通感和客观性通感。通过比较散文与诗歌的视点,对诗歌内视点进行六种剖析,即:主观体验、梦幻色彩、非逻辑结构、心灵的直接表现、无名性、往复回旋等。在语言上,诗寻求超常结构,“破坏”词义,“破坏”语法,音乐性与弹性是诗歌的媒介特征。他还认为“和时代保持联系是诗的生命”,“和读者保持联系是诗的青春”,“诗只能有属于自己的读者群。对诗的行为只有在智力和心灵上都达到相应深度和广度时才能产生”。与早期的诗歌定义相比,这些观点,更逼近了诗歌的本质。正因为对诗歌本体的了解,而且意识到“文学样式总在相互渗透”,吕进坚信“诗人没有文体自觉,就很少可能在诗歌史上长久地站稳脚跟”——他提出诗体重建的核心观念就在于此。为了强化诗体特征,他写过《诗体十题》,对闻一多的“豆腐干”、徐志摩的对称体、冯至的十四行、香港诗人晓帆的汉俳、郭小川的新格律体、袁水拍的仿民歌体、冰心的小诗体以及艾青、余光中、舒婷的自由诗等进行阐述。在《现代诗歌文体论》一书中,吕进提出新诗诗体重建的出路是:完善自由诗,倡导格律体新诗,增多诗体。吕进将这一话题推广到新诗研究界,《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度开设专栏讨论,引起诗歌研究者的广泛重视,成为诗歌研究的前沿课题。

二、呼唤与行动:建设中国现代诗学

吕进在诗学研究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据笔者观察,吕进的学术研究特色与他后来提出的三个“重建”有密切关系。

1997年7月22日,吕进在《人民日报》发表短文《新诗呼唤拯衰起弊》^[6],指出诗歌不景气的原因,一是失语,二是失重;接着他提出三大课题来拯衰起弊:诗歌精神的现代化重铸、新诗诗体的重建以及诗人在文化转型期的重新定位。在他看来,在文化转型期,不能把“对外开放”误读为“作西方诗歌的旁支”,而是要重视诗歌的民族性,要意识到“在建立现代格律诗、完善自由诗中,新诗有一个增多诗体的使命”,新诗要在传媒和传播方式上实现现代化改造。诗人在转型期要重新定位,要建设诗人人格,去“神气”而“洗心”。吕进提出的这三个策略,是针对中西诗歌、诗歌本体特征以及诗人自律而言的,希望能够对开拓有中国特色的新诗发展道路有所促进——这成为吕进提出二次革命的雏形观念。

2005年,吕进在不同场合提出“二次革命”这一口号,“三大重建就是二次革命的逻辑起点”。三大重建即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诗歌传播方式重建,“提升自由诗,成形现代格律诗,增多诗体,是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7]。

从三大策略和三大重建的内容以及吕进的多年呼吁,可以看到吕进的研究特色和研究宗旨。

研究伊始,吕进就有强烈的建立中国特色诗学的意识。他的研究始终与中国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力图寻找适合中国读者的语言去阐述费解的理论术语,实现诗学理论的大众化,他一直强调诗歌文体的中国性。在他的《新诗的创作与鉴赏》中有两个内容与当时同仁的诗歌论著不大一样。新时期谈诗的多数学者,都非常不愿意涉及社会体制,只突出研究时代特色,这可能跟长时期的政治约束有关,研究者们出

世的时候，吕进入世。他要谈社会主义新诗，而且他还要借鉴古人的诗话写作来完成他的新诗话。

诗歌本身与政治体制无关。在特定时期的特殊阶段，特别是意识形态对诗歌有一定要求的时候，诗歌就会与政治发生密切关系。诗歌该以何种方式存在，往往成为一个令文人烦恼的问题。吕进在诗歌美学与社会发展之间寻找平衡点。《社会主义新诗》中指出社会主义新诗“是我国诗歌在社会主义时代的继续、革新与发展，是诗歌史崭新的一页”。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此言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吕进认为民族化、大众化是诗歌形式上的最主要的个性特征，此意沿袭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而来。在一个民众文化素质较低、政治觉悟期待提高的国度，统治者采用武力征服是不够的，若要从精神上确立统治地位，借助文学的巨大作用可以达到。这本是历代公开的策略，无需后人褒贬。文学民族化、大众化观念的提出，显然立足于国家的角度。

吕进提出的社会主义新诗应是对当时诗歌争议的一种回应。也许自 90 年代以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改变了人们原先的刻板印象，人们反过来会认为吕进的提法过时，但不可否认，这正是吕进研究的立足点，他的特色所在是他始终站在国家、民族、时代立场。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有他在 21 世纪提出的“新诗二次革命”。

中国传统文人强调治国平天下，强调责任感，吕进提出诗的使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息息相关。1989 年，他在《诗，生命意识与使命意识的和谐》中说：“优秀诗歌总是生命意识与使命意识的和谐。它是出世态度与入世态度的统一，是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统一，是心理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统一，是摆脱功利与社会指向的统一，是超脱因素、游戏因素与参与因素、严肃因素的统一。”他认为诗人的职责在于“提高同时代人的生活质量：以人格力量和道德力量帮助读者”，“诗要具有真诚的品格”。

1986 年，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在新时期诗歌研究界，这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虽然很多高校都有研究所，然而有的研究所只是一块打制漂亮的牌匾，或是出现在名片上方的一行字。吕进领导的新诗所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学术机构，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吕进试图利用群体的优势，集体攻关中国新诗的某些难题，使新诗研究形成一种风尚，扩展诗歌的影响。20 多年过去了，他的努力和尝试都有了不用言说的成绩。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也相继有了新诗研究所，出版诗歌研究刊物，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中国当代诗歌研究相对于其他文类研究来说，有稳定的队伍，有持续的发展。这种把诗歌研究当做一群学者的终身事业，以群体研究的方式开展工作，也只有在中国才能行得通。可见吕进有一种谋略家的远见。

理解诗歌本身有一定难度，艰涩的诗歌术语更是让普通读者望而生畏。在 80 年代中期，现代西方文论成批译介到中国，对西方理论并不陌生的吕进没有成为理论术语的炒作者。他常常在中国文论中寻觅适合中国读者口味的话语，追求通俗而幽默的学术表达是吕进实现诗学理论大众化的诗学策略。

政治性、社会性话语通过日常生活的过滤而通俗化后，被吕进再度借用到诗歌研究中，成为他独创的诗学术语。这类例子较多，如近年来他提出的“二次革命”和“再次复兴”借鉴了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术语，但他不是社会改革者，他把词语的作用缩小到诗歌领域，仅仅想通过触动人们眼球的词语发动诗的改革。给诗人定义，就像给诗定义，同样都是高难度的，吕进的定义中满是风趣：诗人是文明的“原始人”。原始，即是用“惊喜的目光打量自己的四周。他似乎不懂得人们习以为常的基本常识与逻辑，而是对生活作出不同凡响的新奇领会与感应”。在《论诗的文体可能》中，吕进说，诗是清醒的读者所认可的“梦呓”，诗人是社会所尊敬的“白日梦者”^[8]。针对散文诗要把握的分寸，吕进又说：“散文诗每一个特征都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失去其中任何一方，我们都会失去散文的语言，使‘豆花’或者变成‘黄豆’，或者凝为‘豆腐’。”^[9]

吕进是一位很有文体感的研究者，无论是在诗歌还是诗学研究上。诗话是古代诗人流传下来的一种论诗文体，多为诗人在创作中总结出来的理论，感悟性强，不一定系统，适合表达瞬间的体认，蕴藏着思想精华。在现代诗人那里，戴望舒的《诗论零札》和艾青的《诗论》都属此类。吕进的诗话集中在《新诗的创作与鉴赏》的附录、《给新诗爱好者》的“诗评断想”、“诗话 44 则”和《一得诗话》中。

从吕进的《新诗的创作与鉴赏》附录中简单摘录，我们就可以管窥其诗学观念的全貌：诗要面向生

活,诗要有“人间烟火味”,诗中应有惊人语,诗的力量在于说真话;诗贵创新、诗贵多样、诗贵出格,闯禁区有胆、闯闹区有识;诗的朴素美、诗的平淡美;诗人应是博识家,鉴赏趣味的多样性,鉴赏的能动性,不以人废诗、以诗废人等等。可以看到吕进并非把诗歌看成是阳春白雪,而是面向大众,面向生活,要求诗人有识见和审美意识,读者要培养一定的素养,达到诗人与诗、诗与读者的和谐。

吕进的诗话重感性领悟与理性分析,并重在领悟和分析中揭示创作、接受状况。他注意到古代文论的现代性转化,有的诗话从古代诗论中直接借来,如《一得诗话》借用古代诗论的一些重要概念:“披文以入情”、“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文质彬彬”、“无理而妙”、“诗出侧面”、“用事”、“回文”等,经吕进结合现代诗歌文本的细读,对它们进行现代性的阐释。

三、开放与入世:敞开的诗学活动

在笔者看来,从五四时期到1920年代中期,胡适、郭沫若、闻一多、戴望舒等人的诗歌创作尝试与体验开启了中国现代诗学之门,理论探讨和技艺切磋都限于同行之间。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现代诗学于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在大学课堂开设之后,才真正有了一定的基础。1929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开设新文学研究课程讲授新诗,1930年代在课堂传播新诗的有武大的沈从文、苏雪林和北大的废名、朱英诞等,这批学者后来成为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或古典文学学者。他们在大学的课堂上评论新诗,有的也尝试新诗创作,以后各自都有诗学讲稿或专著出版,成为现代诗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在现代诗歌研究史上,有关诗歌理论的研究专著与当代诗学著作的数量相比,非常少,如朱光潜的《诗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话》、梁宗岱的《诗与真》、《诗与真二集》、袁可嘉的《新诗的现代化》等。在现代文学学科未正式确立之前,学术上以古典文学研究为正宗,无论新诗创作还是新诗研究,在崇古环境中都是“古之余”或聊以谋生的手段。多数学者在结束新文学课程后,基本上与新诗告别(朱自清过早去世,另当别论)。80、90年代以后培养的新一代诗歌研究者(研究生),有一部分嗜诗如命,为诗消瘦到今天;也有一部分不排除为文凭和前途需要,当文学走向边缘,诗歌也不再成为文学青年议论的中心时,他们选择了改行,把诗歌当作青春时期的回忆。其间就是吕进这一代,他们应时代而生。年轻时有着对诗歌的崇拜,用激情写诗;中年时期,沉默过;70年代末的朦胧诗讨论引发他们走上诗学研究之路,为诗歌基本理念、诗歌审美传播开辟沃土,即使遇上诗歌冰川,仍然坚持着把诗歌当做终身事业,在高校一直从事诗歌教育工作。从时间上来看,如果允许把朱光潜、朱自清、苏雪林、废名等命名为第一代中国新诗学院批评与研究者的话,那么80年代起步的这批研究者可以命名为第二代中国新诗学院批评与研究者的话,那么80年代起步的这批研究者可以命名为第二代中国新诗学院批评与研究者的话。

在这一代学者中,吕进和大多数学者一样,具有学科前沿意识和诗歌教育意识。关于前沿意识,陈仲义曾针对吕进的《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新诗研究》^[10]发表过不同看法,他认为吕文忽略了另一支在后20年从事先锋诗歌研究的中青年队伍,对诗歌前沿也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诗歌研究前沿是新诗的转型研究而不是文体理论。不过,在笔者看来,前沿不是排座次的简单事情,前沿问题应是学者集中精力关注较多的问题。笔者非常赞同诗歌转型对于研究当代诗歌是一个重要问题,但笔者也意识到这是从现代诗歌史与接受史的梳理过程中发现的一个关键性问题,目前国内有不少学者在为之努力。吕进关注的文体问题,是他多年来在与其他文类的比较当中发现的诗歌的另一个关键性问题。他一直在思考新诗的艺术创造中“变”与“常”的问题,希望能够在对诗歌文体、诗歌形式的分析中,把握住诗歌的特殊性。因此,他的前沿与陈仲义的前沿构成了两种不同的研究风景。新诗的文体研究在当前有不少学者投入,年轻学者陆正兰写出了国内第一本《歌词学》;王珂的诗体研究兴致正浓,有《新诗诗体生成史论》、《诗体学散论》等著作问世。这些成果不能不说是来自吕进诗学思路的影响。吕进从对诗歌基础理论的梳理,加深入到诗歌理论的研究,逐步完善中国现代诗学观念,在这一过程中也培养了不少和他一样具有探索精神的诗学研究生和诗歌学者。

吕进在《大诗人的特征》中谈到开放性问题。他认为对外部世界、对读者、对民族传统都要持开放态度^[11],他自己也正是以开放态度进行诗学研究。带着学术热情不断寻找问题,制造研究热点,以期引起研究者以及大众的反响,使问题在探讨中能够更深入。

再次回到吕进提出的“新诗的二次革命”、“再次复兴”命题。这类名词在我们这个提倡和谐的时代有点耸人听闻,容易使人联想到百年前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政治、流血、暗杀等历史。通过对吕进学术思路的了解,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来自他个人生命力的感召,他试图在诗歌疲软之时发出振聋发聩的一声,唤醒大众对诗歌边缘化的重视。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当下诗歌已经步入个人化写作进程,集体意识与个人想法在诗歌写作中已经割裂,不少诗人对创新所做出的是片面理解,不少诗歌写作者在关注求新求异的同时,忽视了诗歌灵魂的天折,造成了诗歌难以勃兴的现状。没有稳定的接受群体,没有相对成熟的诗歌写作群,诗歌存在危如覆巢之卵。从90年代观念酝酿到2005年在绍兴文理学院讲演,在华人诗学名家国际论坛大声呼吁,在学术刊物上组织多期探讨,吕进自己播下第一颗诗歌“革命”的种子,通过多种渠道燎原,力图扭转危在旦夕的诗歌命运。直到2011年的今天,吕进还在《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组织讨论,吸引四面八方的学者。这一主张能否最后成功,有待来日。不可否认的是,它已经在当代诗坛和诗学研究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经过多年耕耘,吕进和他的同事把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建设成了研究中国新诗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学术领地。从中国新诗的基本原理开始,对中国诗歌文体进行系统性研究,涉及到诗歌教育、中外诗歌比较、歌词学,不少轰动性的诗学话题从那里开始。再次,与新诗所一同诞生的,有新诗所的内部交流资料《中外诗歌研究》,还有2009年创办的学术丛刊《诗学》,以及《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中国现代诗学”专栏,更多的诗歌话题得以展开讨论,在国内外学术界保持着影响力。在吕进的办刊风格中,还可以看到他的另一种开放性:刊物的作者队伍,不光是新诗所的教师,还有中国社科院的张炯、北京大学的孙玉石、武汉大学的陆耀东等诗学名家,不少的诗学博士都在他主编的栏目发表过重要的学术论文,由此可以看到吕进对现代诗学学科实实在在的奉献。

与完全沉迷于诗歌世界中的学者不同的是,吕进敞开书斋大门。积极入世,是吕进的人生态度;学以致用,是吕进的学术信条。只要与诗歌有关的事,吕进都亲力亲为:组织社团,创办刊物,召开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扩大中国新诗研究的影响;参加鲁迅文学奖的评奖,组织编写重庆新诗发展史,倡议培育重庆地区的人文精神,为自己培养的学生和他欣赏的诗人写序等等。他渴望用个人与群体的更大力量(不排除运用社会和政府的力量),引起更多人对诗歌的重视,从而达到用诗和诗歌活动影响他人的效果。这一切都跟吕进后来的重建理念密切相关,可以看到,吕进与众不同的是,他还是一位讲求实效的诗歌研究者,不仅把诗歌看成生命,而且是正在成长和需要延续的生命,生命中的生命。因此,由诗歌激发出与时代、国家、民族、大众、个人相结合的举动,成为吕进诗学研究的显著特质。

参考文献:

- [1] 吴思敬. 诗歌基本原理[M]. 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
- [2] 吕进. 新诗的创作与鉴赏[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
- [3] 吕进. 中国现代诗学书后[M]//中国现代诗学.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 [4] 吕进. 中国现代诗学[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 [5] 孙绍振. 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M]. 北京:语文出版社,2009:223.
- [6] 吕进. 新诗呼唤拯衰起弊[M]//吕进文存:第3卷[M].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38.
- [7] 吕进. 三大重建:新诗,二次革命与再次复兴[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130-135.
- [8] 吕进. 论诗的文体可能性[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3):80-89.
- [9] 吕进. 散文诗的语言[M]//吕进文存:第2卷.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10.
- [10] 吕进. 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新诗研究[J]. 文学评论,2002(5):74-81.
- [11] 吕进. 大诗人的特征[M]//吕进文存:第2卷.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45-247.

责任编辑 韩云波